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陈康：论希腊哲学



商务印书馆

始于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陈康：论希腊哲学

汪子嵩 王太庆 编



商务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康:论希腊哲学/汪子嵩,王太庆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 - 7 - 100 - 15211 - 2

I. ①陈… II. ①汪… ②王…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
学—文集 IV. ①B50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650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陈康:论希腊哲学

汪子嵩 王太庆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211 - 2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2 1/4

定价:202.00 元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年以后,本馆虽以译介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1980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 120 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 年纪念版（200 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11 月

凡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编 者 的 话

陈康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上西南联大的时间较晚，1943年以前他在联大讲的课程我们没有听上。1944年陈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授课，他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于是年正式出版，这本著作使我们耳目一新，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哲学史的一个新天地，启发了我们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1945年秋至1946年春，陈先生回联大讲授“希腊哲学史”课程，并给我们领读柏拉图《国家篇》第四、第六卷的重要部分。1947年初至年底，他回北京大学任教，讲“知识论”、“柏拉图的辩证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重点讲授他的博士论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一书的内容）等课程外，又给我们领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 Z、H 卷。我们面聆先生教益不多，但从课堂里听到的，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学到的，却深深感到陈先生教给我们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玄虚、不取道听途说、不作穿凿附会的方法，是研究哲学史、特别是研究古典希腊哲学史的一种重要方法。研究哲学史当然可以凭学者各自的喜好选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陈先生采用的可以说基本上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传统研究古典哲学的方法，它需要深厚的学识基础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现在国内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以至希腊哲学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为了让大家了解这种方法，以促进和提高我们的研究，我们选

编这本论文集，展现陈先生的思想和若干研究成果。

一

陈先生使用的研究方法，在1985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的“作者自序”中有所说明。陈先生谈到收在集子中的文章时说：

“各篇皆写于1940年至1958年之间。（1958年9月以后留居海外，因为环境关系，所有写作皆用当地文字，以便土著阅读。）1958年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其间个人的思想，自然不能毫无变更。如若今日将各篇就原题重写，虽然每一篇不必皆和原来底稿不同，但可断言的，许多篇的前后两稿不免皆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假我数年’再作第三次的重写，焉知此后所写的和第二次所写的决无差别？因此内容是有变动的，也就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构思和写作的方法。方法是比较固定的，也是主要的。数十年来思想的内容不无或多或少的变更，但是方法仍然如旧。如若读者留意这本小册子里的方法过于其中的内容，那即是适合下怀了。以下请略说这方法，先从这里所无的方法说起。比如：

无父无君的杨墨‘是禽兽也’的推论。

用于蒙混过关的‘白马非马’的分析。

在自己的意见上挂起前人的招牌（‘仲尼墨翟俱道尧

舜’）。

或用前人的言论来增高自己的意见的价值（‘六经为我注脚’）。

用从半空中飞下来的结论作推论的前提（‘道曰式，曰能……’）。

打着万应灵丹的旗号，其实是空洞无内容的论断（‘方有方之理，圆有圆之理’）。

这些方法或是就幼年所读书籍中至今略存未忘的片断记忆里举隅，或是中年以后耳目偶闻偶见的事例。这些方法皆见于自先秦时期以至民国二十、三十年代的思想史里。类似的方法自然还有，此处不必求全。然而我们最不应忽略的乃是以下的方法：自从‘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

方法的目的在应用，它不是供讲说的。讲说方法乃是对方法的回想。用方法的人回想他自己所用的方法，时常反不及旁观者所见的周详精细。以下所简略陈述见于这本小册子里的方法即是此类回想。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

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纵横不羁人士看到这方法的简略叙述，将要失声大笑说以下这类的话：‘陈康笨拙得可怜，智力卑劣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在构思和写作时，处处甘受束缚，以至于吐不出一句自由解说的话来。’这个判语不但符合实情，也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然而这些人忘记了：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做诗和研究，二者悬殊，它们的方法也必然不同。

读者之中想会有不是动辄跳跃飞腾，不喜欢一步一步前进的人。他们对于以上简略陈述的方法，也许感觉到兴趣，不惜予以青睐，审查这方法在各篇中的零碎应用。审查的结果或是立即抛弃，或是暂留备考。鄙视与垂青，抛弃与保留，性质各各不同，但皆是对这本小册子的反应。如若这本小册有了反应，编者的苦心和辛勤就不枉费，他们也可稍得安慰些了。如若初步同情的读者在他们以后构思和写作学术性的文章时，这本小册子里的方法能有些微的帮助，那时编者们将更是心满意足了。”（《陈康哲学论文集》二一四页）

陈先生的这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要做到他所说的这种方法——“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

断”——必须有深厚的学力。为此,需要简单介绍陈先生的经历和思想。

陈康,一名陈忠寰(Chen Chung-Hwan),江苏扬州人,1902年生。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哲学系。1929年秋至1930年夏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30年秋起转往德国,从Julius Stenzel学希腊哲学,后来主要从Nicolai Hartmann学习。在后者指导下,于1940年以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论文取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生以十年时间,在德国从这几位著名专家学希腊、拉丁文及希腊哲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0年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秋任台湾大学教授。1958年赴美国,历任Emory University,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Post College of Long Islan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exas,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等校教授,后年老退休,留居美国。

陈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三部专著:Chen Chung-Hwan: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Berlin, 1940;陈康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北京重印;Chen Chung-Hwan: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Georg Olms Verlag, Hildesheim. New York, 1976。其余则是发表于国内外各种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收入本书。

陈先生在1976年出版的、可以说是概括了他毕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成果的巨大著作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一书的序言中,对他自己思想的发展作过一番简略的回顾。试译如下:

“每个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都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在耶

格尔(W. Jaeger)影响下产生的，虽然本书的一般结论及许多解释和耶格尔的有所不同。我要说明一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以及这本书是如何发展成的。

本世纪三十年代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复活了本体论，并且给了它一个文字定义，这定义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方式的德文翻译。1940年我结束了论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以后，想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一番更一般的探讨。当时我是在哈特曼的影响之下的。我考虑的计划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他的神学分开，单独进行研究，但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困难。

这时候我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聘书，它是战争时期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组成单位。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是胡适博士领导的‘汉学’(它多少有点相当于西方的 *Altertumswissenschaft* [古学])的中心——实际上是最唯一的处所。我到昆明时，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仍然存在，我以前的老师、后来的同事和朋友汤用彤教授是其领导人。这个新的学术环境恢复了我对‘古学’的兴趣。我重读了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进而坚信必须用他的发生方法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结果是我从哈特曼转向了耶格尔。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也从系统的方法转为发生的方法，研究对象也扩大为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两个方面。

几年以后，在台湾我用学术补助费买到一批西方书籍，其中有欧文斯(Joseph Owens)的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这位作者的解释引起我的兴趣，但不能令我信服。这样我的研究范围就更加明确了：要从发生观点研

究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和关于神的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这就成为现在这本书的对象。

欧文斯神父的著作由于他的博学得到我的赞赏，同时也使 我认识到在台湾因为缺乏足够的书籍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计划。结果是 1958 年我被选为中国哲学会的代表去参加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哲学会议。我原来想会后留在梵蒂冈工作，但由于语言的障碍不可能实现，所以来到美国。最初我想用六个月的时间查阅最重要的有关文献，但这是不现实的。我需要多留些时候，便接受了 Emory 大学的聘书，开始在美国教书。……”(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pp. VII—VIII)

由此可见，陈先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哈特曼和耶格尔的影响。他从这两位学者各自接受什么思想影响？本书内《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和“恩泰莱夏也阿”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开始处，陈先生作过概要的论述。他指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陈先生译为“万有论”）思想被长期忽视，直到哈特曼才重新恢复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古代开始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直到耶格尔才开始用发生方法去研究他思想的发展变化。因此，重要的问题是用发生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陈先生说：

“然而从 Jaeger 门下训练出来的人未受 Hartmann 的哲学训练，虽然已能做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但还未能认识万有论方面的问题；从 Hartmann 门下训练出来的人，未受 Jaeger 的历

史研究训练，虽然已能认识万有论的问题，但仍不能做历史研究的工作。因此在二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史上至今还无一人从发生的观点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万有论。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这个研究工作正待人去做，另一方面却无适当的人才献身于这样的工作。为了不使这个无结果的僵局继续延长，以致我们忘了自己学识的浅薄，不揣谫陋地来作一个尝试。”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陈先生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这本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始和若干组成部分，总的研究成果则是 1976 年出版的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一书。这项工作，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中还没有人做过，也就是说，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有开创意义。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对西方已经研究了二千多年的希腊哲学史），要能和西方专家一争短长，是很难能的。1944 年陈先生应当时由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要求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在“序”中曾说道：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1982 年版第 10 页。）

虽然陈先生后来许多重要著作仍旧是用外文发表的,但是这番话却表达了我们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工作者应有的抱负。

二

自从 1979 年学术研究重新繁荣,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比较受到重视时起,我们就想介绍陈先生的著作。应我们的要求,商务印书馆于 1982 年重印了陈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引起许多对希腊哲学有兴趣的读者们重视。同时我们就着手收集陈先生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上的著作。主要由北京图书馆焦树安同志帮助,从馆藏书刊中找到 1940—1948 年间陈先生发表的中文著作。陈先生在中央大学时指导的研究生陈步学兄也保存了其中几篇论文,特别有价值的是《哲学自身的问题》一文中还有陈先生的几处亲笔订正。我们还找到 1940 年以前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时写的两篇中文论文:一篇是 1934 年写的《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王太庆解放前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发表此文的那期《哲学评论》;另一篇是 1935 年写的《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原稿是贺麟先生在旧藏稿件中找出交给我们的;我们曾交给 1983 年出版的《外国哲学》第三辑公开发表过。这两篇陈先生早期著作的观点虽然和他后来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对柏拉图认识论的研究兴趣,以及他当时已经重视分析原著的方法,所以我们仍收入本书。

陈先生用外文发表的著作在国内很难找到。1940 年用德文发

表的博士论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是请王玖兴学兄(1945—1946 年他在昆明和我们一起听过陈先生领读柏拉图《国家篇》)去欧洲时在德国找到原书复制带回的。陈先生的好友, 曾在德国和他一起从哈特曼学习过的熊伟先生发现并告诉我们若干陈先生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目录, 但大多发表在非常专门的学术刊物如 Phronesis 上, 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杂志。我们请在美国的王浩学兄(1943 年他在西南联大数学系本科三年级时听过陈先生的课)代为收集。他花了不少精力, 几次从各种刊物资料中将陈先生用英文写作的论文复制寄来, 共九篇, 目录如下:

- 1) Plato's Theistic Teleology ;
- 2) Aristotle's Theory of Substance in the Categoriae ;
- 3) On Aristotle's two Expressions: $\kappa\alpha\theta'$, $\dot{\nu}\pi\omega\kappa\epsilon\mu\acute{e} \nu\omega\lambda\acute{\varepsilon}\gamma\epsilon\sigma\theta\alpha\iota$ and $\dot{\varepsilon}\nu\dot{\nu}\pi\omega\kappa\epsilon\mu\acute{e}\nu\omega\acute{\varepsilon}\iota\iota\nu\alpha\iota$;
- 4) Aristotle's Concept of Primary Substance in Book Z and H of the Metaphysics ;
- 5) 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K 7 , 1064^a 29 : $\tau\omega\tilde{\nu}\ddot{\nu}\nu\tau\alpha\varsigma\tilde{\eta}\ddot{\nu}\kappa\alpha\iota\chi\omega\rho\iota\sigma\tau\acute{\o}\nu$;
- 6) 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term Energeia in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
- 7) Aristotle's Analysis of Change and Plato's Theory of Transcendent Ideas ;
- 8) From Plato's Receptacle to Aristotle's Matter ;
- 9) Universal Concrete — A Typical Aristotelian Duplication of Reality.